

“科学”的价值诉求在现代中国的转型

□李明宇 李 丽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科学”一词引入中国之初,就被视为一种价值体系,被赋予价值维度的理解。在“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科学发展”的转换过程中,“科学”更多地承载了立国、兴国、强国的使命,展示出其价值诉求的转型历程。这种价值维度的梳理为当前科学发展道路的理念确立和价值选择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依据。

关键词:科学;价值诉求;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科学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是当下紧迫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非常有必要回到问题原初,追溯“科学”概念在中国发展的意涵转换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科学”一词引入中国到当前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根本任务,中国经历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科学发展”的百年历史进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实证化理解的阶段,也表现了与西方人对科学的实证化理解相似的思维路径,但是总的来说,无论国人把科学视为知识还是方法,抑或是某种认识的原则,实际上近代国人对科学进行实证化理解一开始就仅仅是其对科学的价值化理解的前提而已。“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多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被视为是救国、兴国、强国的灵丹妙药。它更多地承载了立国、兴国、强国的使命,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诉求。

一、科学救国中“科学”的价值诉求:立国使命

在“救亡保种”的社会背景下,从林则徐到陈独秀,从洋务派到民主派,许多先进的国人

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学,他们设计了多种引入西学的方案,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取舍,逐渐完成了一个对西学逐步认同与推崇的过程。

维新思想家是在形上层面对科学的典型。科学经验原则和逻辑原则被泛化,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方法进入其他社会领域。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科玄论战”中,科学的观念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范型已逐步深入人心,国人对科学的价值诉求的倾向已经展现得非常明显了。随后,科学观念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发生了实践转向,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文化纲领中重要的元素,在立国使命完成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以“新文化”的面孔出现,侵入到了精神层次和心理领域,成为国人解放思想、追求新知的精神武器。

在维新思想家那里,科学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价值体系和理性精神,是救亡图存的重要突破口。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应该仅仅借鉴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层面,还应该从科学技术的文化深处寻求原因。因此,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结合民族需要,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西方科学,维新思想家严复和康有为就是最初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加以接受的典

收稿日期:2015-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X017);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JDSZK076)

作者简介:李明宇(1975-),男,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丽(1975-),女,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型代表。在严复看来,“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1],公例(规律)已经被视为“道”、“理”,具有了一般性的普遍意义了。在严复眼中,“科学”就是一个通过归纳法实现的,以“修齐治平”为指向的价值体系。科学方法的价值指归恰恰是通过归纳法与形而上学的内在沟通实现的。康有为指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2]。在这样“物质救国”的基础上把对科学的认识不断引向深化,遵循着“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的宗旨,把几何学的演绎方法运用到了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上,并依此构筑了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在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和谭嗣同那里也表现出了对科学浓重的价值诉求。对此,笔者在另一篇论文《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中也强调指出:“梁启超把科学方法作为道德实践和民族精神来看待。而谭嗣同的仁学体系力图将西方近代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实学精神统一起来,实际上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加以接受的。”^[3]并在该文的结尾总结指出,“尽管不同的思想家由于各自的经历和思维展开方式的差异,致使他们对科学形上理解的具体情形和展开构建现代性方案的角度、方式等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诉诸于西方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精神来寻求现代中国发展方略的路数却是一致的”^[3]。在这里,笔者一再坚持认为,维新思想家恰恰是在形上之维接受“科学”的,展示了对科学的超越了实证层面的价值诉求。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一起被视为是新的价值权威和新社会的理想,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尤其是在“科玄论战”中,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与以张君勱、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尽管“在科学与人生观之间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生活本身就蕴涵着一种人生观”^[5]。论战后期,由于陈独秀、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

结盟,致使科学派最终战胜了玄学派,确立了科学的价值权威。正如胡适当初所断定的,“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诽谤‘科学’的”^[6]。这个价值权威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着它的尊尚地位,不仅在五四时期如此,后来也是长期延续。比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开幕词中开宗明义:“科学社宗旨,自在发达科学于吾国。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7]。这样的界定突破了康有为“物质救国”的局限,把科学的精神放在了亟待培育的地位上,完善了“科学救国”内涵。可以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包括中国科学社在内的一些组织化的团体,显示了体制化发展的苗头,但实际上“科学”观念的发展与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并没有体现出内在的联系。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几乎是完全架构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它扮演的是最高意义上的救亡之神,并由此发展成为一种独断和价值权威。

到了30年代,“科学”观念发生了实践性的转向,逐渐地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潮转化为实际行动,即从观念之域转入了生活之域,展示出了强化的趋势。这种转向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复兴中华民族而发起的期冀通过发展科学的途径来拯救国家的文化运动。当时的一批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教育家企图通过这样的文化运动来让科学掌握大众,利用科学的文化方式来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但是,同样是作为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社会效果却存在很大的区别。虽然中国科学化运动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支持者国民党政府在弘扬“赛先生”的同时,忽略了“德先生”,因此很快走向颓势。相反,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高扬科学

与民主两面旗帜,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新启蒙运动,倡导新民主主义,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大业。至此,科学的价值诉求——立国使命完成了。

二、科学兴国中“科学”的价值诉求:兴国使命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在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重重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无法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近代科学的自下而上、盲目、分散,导致它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不可能与国家的实际建设相结合。直到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迫害,这一巨变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动力。中国科学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踏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在新形势下转变为谋求社会经济发展和平环境。虽然国内鲜见对“科学”的理论宣传,但实际上,“科学兴国”的信念一直蕴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中,科学的强大力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针对我国工业生产和科技薄弱的现状,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经济复苏和生产重建这一中心任务,确立了发展科技的主导思想,并制定了具体而详实的规划,喊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这里仍然寄托着国人对科学的价值期求。随后的科技“大跃进”则使人们陷入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狂热状态中,显示了“科学救国”观念下人们对科学价值的真诚体认在新环境下的延续。科技“大跃进”的危害性又使人们意识到纠偏的必要,于是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文革”时期,科学的价值追求淹没在以文化革命为动因的政治革命的漩涡之中。在狂热的政治浪潮中,自然科学家遭到批判和迫害,基础理论研究弱化,科学研究的热情遭到压制。

“文革”过后,文化界和思想界展开了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确定无疑的信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既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精髓与核心。他一再强调,科学技术不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而且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也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8]这一划时代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功能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深化,又凸显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战略地位。在经济中心的标杆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尊重人才成了普遍的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要进步,创新是关键。科技创新能够证明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不败之林的重要标志。因此,科技问题本质上是知识问题和人才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引发了“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确立。江泽民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9]这里虽然不乏对科学技术的理性思考,但是实际上科学仍然被视为实效性和真理性的标签,甚至一度出现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局面。在对科学价值强烈期求的心理态势下,人们对科学技术少有反思。这一时期出现了科学与人文发展的某种程度上的疏离,人们在追求科学价值的同时不经意间失落了人文精神。令人欣慰的是,随后不久,这种疏离就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开始了审慎的思考和反思,并结出了新的硕果,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硕果的体现。新中国的“科学”发展理念走向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科学发展中“科学”的价值诉求：强国使命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面对国内外各领域的新形势新特点,我国科技事业的出场语境和价值诉求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可见,单纯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需要,我们所要达成的是一个“不仅国富、而且民强”,即国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型社会。它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和动力,而且需要铸造一种新型的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作为它的终极体现。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在科学发展问题上,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战略思考。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的本质意义,准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的价值本质、特征、目标和原则,才能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地把握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诉求,走出一条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新路。在这种情境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道路顺势而生。

所谓科学发展,首先是观念转型。针对社会发展实际、结合改革开放和国外经验总结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观念转型的成果。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基本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又好又快发展为思路,以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规定,以人的终极关怀为最终诉求,在实践基础上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好中求快”的精神实质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又满足了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标与手段、真理与价值等原则都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体现出深厚而长远的价值意蕴。

作为“发展观”的限定词,“科学”表征以人为核心的自然、人、社会和谐统一的发展状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视角的全新转换。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展现了更适合的人的发展信念和目标以及全面统筹的运筹方法。“科学”的独断被打破,它已经被视为是自然、人、社会和谐发展的“均衡器”。科学技术的价值仍然被肯定,但是发展科技的准则和方式均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必须把它放在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中,考虑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延续性,高度关注人文关怀,深刻认识到科学的人文本性,把民生幸福看作是比科技发展、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此,科学作为人的创造活动决不是与人无涉的纯粹的自然学科,它必然与“人”这一主体的形态紧密关联,历史上任何科学的图景都来自于人的投影。正如孟建伟教授所言:“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技术价值,而且 also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反之,人文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而且 also 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技术价值,因而在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线。”^[11]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范式把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将“以人为本”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既着眼于人的现实物质需求,又着眼于人民素养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服务于人的深切人文关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开始突破过去对科学的片面化理解,在重视科学工具理性的同时,将“人”的终极关怀,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应当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紧密联系且全面发展的科学;应当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者辩证统一的综合体系。所以,我们在科学发展中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价值标准,促进我国科学朝着更加理性、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科学”包含了中国近百年发展的科学观念的反思,体现出了更深刻的人文性和系统性,表明了我们对于“发展”的理性认识和成

熟体认。在“科学”这个具有人文性和系统性的全局性战略思想中,承载着强国使命的价值诉求,体现着科学理念与价值诉求的统一。恰恰是由于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结合,才使得科学发展观凝练了发展的科学性,凸现了发展的价值性,恰到好处地完善了发展的思想。以尊重人的价值为核心,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科学发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国之梦的必要手段。当前,我们已经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转换为以创新为核心、以协调为内在要求、以绿色为必要条件、以开放为应然选择、以共享为必然结果的发展理念,并把它们贯彻和融入到我们的各大方针和政策之中。在这里,“科学”发展观念的价值指向恰恰是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学”正是通过凸显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理念和行动的体系在一步步实现它的强国使命。

四、结语

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意义上看,科学在中国本土化进程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相应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视角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成熟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价值诉求的现代转型是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从知识论走向文化论,从片面理解走向全面理解的过程。随着时代背景转换和文化变迁,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一步步深入和拓

展,逐步趋向对“科学”的理解从“小哲学”向“大哲学”的转换。这种转换与中国由独立走向富强的历史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关联包含了当前科学发展的价值选择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依照这个逻辑线索,我们找到了走科学发展道路的方向指导,更加坚定了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 [1] 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61.
- [2] 谢遐龄.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75-576.
- [3] 李丽.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6).
- [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M]//王中江,苑淑娅.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296-297.
- [5] 孟建伟.科学与人生观新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4(4).
- [6]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0.
- [7]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88.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 [9]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1.
- [1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1] 孟建伟.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关联[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责任编辑 李 劲)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the term “science” was seen as a kind of value system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value dimensi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e slogan ideas from “saving our country/China through science” to “(re)invigorating our country/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developing science (for our country/China)”, in which the “science” has been invested more with its missions of building up, (re)invigorat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country/China,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its value appeal. This review from value dimension could provid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evidence for pres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s well as its value selection.

Key words science; value appeal; saving our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invigorating our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developing science for our country